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

侦探卷



于润琦 主编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 · 偵探卷

洪迅 点校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侦探卷/于润琦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ISBN 7 — 5059 — 2595 — 4

I. 清… II. 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997 号
.....

书 名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侦探卷
作 者	于润琦 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责任编辑	奚跃华
责任校对	洪 迅
责任印制	董 华
排 版	北京1202工厂
印 刷	平谷县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67千字
印 张	16
插 页	3
版 次	1997年7月20日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2595—4/I·1926
定 价	22.6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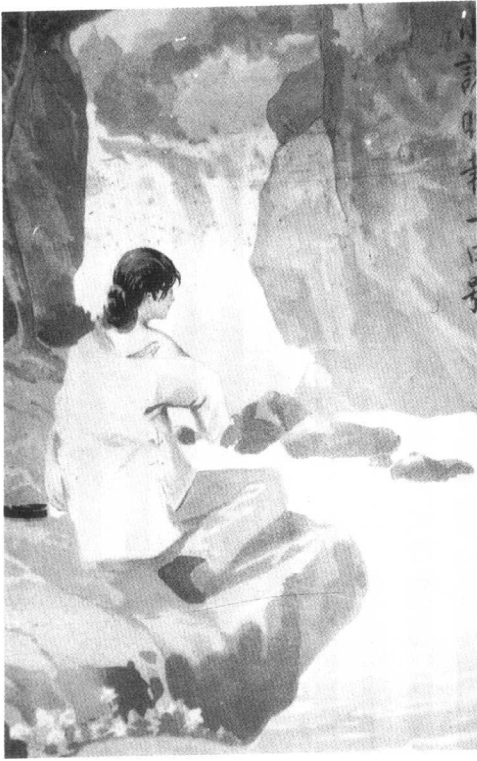
丁 悚



劍 痴



0A6758/02



梦棣生

天虚我生



《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编委会名单：

名誉顾问 吴晓铃

顾 问 侯忠义

主 编 于润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润琦 马文大 王之嫫 王致军

刘乃英 宋 梅 宏 怡 吴 洁

吴 葳 陈 敬 周春华 杨之锋

洪 迅 赵淑清 奚耀华 韩 毓

程 敏 郭亚南

序

记得一九七五年，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修订《中国小说史》的工作，我负责近代小说部分。其时感到最困难的，还是资料的匮乏。能够自由阅读的就是阿英编的《晚清小说丛钞》，除此之外的其它晚清小说，几乎都看不到。所以造成在小说史中，除了介绍几部易搜求的著名长篇小说外，对短篇小说及其流派只是约略提及而已，因此也就留下了一个遗憾。

写古代小说史的人，大都如此，对清末民初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交替与转变，以及外国翻译文学对我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诸问题，或轻描淡写，或语焉不详，他们不是不想深入研究，而是没有资料。近十年来，我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小说资料，尤其是在短篇小说方面，仍感薄弱。这次，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实即清末民初短篇小说集）的出版，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憾，可喜可贺。

清末民初短篇小说极富研究价值。因为它最灵活、最便捷、最迅速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特点。从集中所选的八百余篇作品和所分的十个门类来看，数量众多，很有代表性。它们题材多样，思想丰富，手法各异，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大动荡时期的各种思想，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清末民初的

社会生活画卷。这部小说集，既是研究这段小说史的资料，也是研究清末民初思想、文化、民俗、社会学的资料，同时也是广大读者难得的一部阅读、欣赏的作品。

这部小说集的编辑实属不易。刊登短篇小说的晚清民初报刊不下几百种，且分散藏于各地，如今要一一翻阅、鉴别、筛选、整理、抄录、分类，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程，且需具备一定的学识水平，主编于润琦可以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就职于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工作之余，不断进行古代小说的整理与小说作家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我祝他精益求精，编出更多更好的书出来。

侯忠义

1997年2月23日，于北大。

我国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代序）

于润琦

清末民初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国内外不少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小说有过研究，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晚清戏曲小说目》，康来新（台湾）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袁进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及米列娜（加拿大）的《从传统到现代 19 至 20 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等。他们对清末民初文坛的长篇小说有着不少真知灼见，但对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却言之甚少，有的甚至词焉不详，使人不无遗憾。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有个统计。从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即《瀛寰琐记》发表蠡勺居士译英人的小说《听夕闲谈》至“五四”之前的小说近万种。其中译作约有三千二百种，剩下的创作小说有一万六千余种。在这些创作小说中，当然包括长篇和短篇。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只收千余种成书，而其中大部分是译

作，创作不过近四百种^①，虽然民初以后的小说创作会更多，但行世的单行本并不多见，粗略估计，这期间的短篇小说不少于万余篇。据我们的统计，这时期的小说可谓种类繁多。门类达二百余种^②，尽管当时小说的分类不够科学，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分类的实际情况。

清末民初小说的繁荣与当时大量刊行的文艺报刊是分不开的。这时期的文艺报刊蕴育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小说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南方文坛（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像李伯元、吴趼人、欧阳钜源、曾朴、梁启超、苏曼殊、周桂笙、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王钝根、王西神、徐枕亚、蒋著超、吴双热、刘铁冷、李涵秋、李定夷、陈冷血、黄山民、胡寄尘等与当时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游戏杂志》、《民权素》、《小说林》、《小说海》、《娱闲录》、《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月报》、（商务）《妇女杂志》、《中华小说界》等著名的文艺期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是杂志的主撰，就是杂志的笔政或特约撰述。他们对当时南方文坛的繁荣做出很大贡献。

当时的北方文坛也不甘寂寞，京津地区也涌现出几十种白话报^③，知名的《京话时报》、《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等白话报培养了损公（蔡友梅）、徐剑胆、丁竹园（国珍）、自了生、冷佛、市隐、湛引铭、耀公、涤尘、钱一蟹等一批京味儿小说家。他们谙熟京都的逸闻掌故、风土人情，写出地道的京味儿小说，展现了一幅清末民初古都北京的风俗艺术画卷，为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留下可贵的资料。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京味儿小说的版本情况，这类小说有四种本子：一种近似 16 开，一种近似 32 开，一种近似 48 开，一种近似 64 开^④，另外《京话日报》还出版了一种名为“新鲜滋味”的系列小说^⑤。

正是由于这些专业小说作家的出现，才使得当时的南北文坛异常活跃。尽管这些作家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且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不很一致。但是在借鉴模仿西洋小说，改造中土小说这一点上，却有着相近的主张。他们执着地追求文学创作，以至有人耗尽自己的心力^⑥。正是由于他们的呕心沥血才创造了丰硕的艺术成果，才使得“五四”时期的文学家们受益匪浅，才使“五四”新文学达到颠峰；尽管他们逊色于“五四”时期的作家；尽管他们没有创作出惊世骇俗之作，但是他们毕竟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没的。“五四”作家中的不少人是在清末民初小说家们的基础上起步的。鲁迅、周作人曾模仿过梁启超、林琴南、陈冷血的译笔；而刘半农、叶圣陶则是《礼拜六》、《小说时报》等杂志的积极撰稿人；至于胡适之、陈独秀也先后在《竞业旬报》等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东洋车夫》、《苦学生》，进行过新文学的尝试。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是一派相承。不可割裂的。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兴起于1906年^⑦，其时在北方的报刊上也已出现白话短篇小说^⑧；1907年的《小说林》^⑨、1908年的《月月小说》对短篇小说的征求^⑩及1909年的《小说时报》和1910年的《小说月报》对版面的设计^⑪，都说明当时文坛对短篇小说的倡导和需求。而《小说林》的主编徐念慈则更自觉地从文体上把短篇小说和章回小说加以区别^⑫，说明短篇小说在当时文坛的重要位置。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能够结合当时的政治思想运动，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事。如无名氏的《痛定痛》借一老汉之口控诉了清军入主中原的罪恶，同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满王朝的政治主张；又如高太痴的《梦平倭寇记》则虚构了一儒生在甲午海战后蒙受朝廷的重用的故事，同时也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再如吴研人的《预备

立宪》，则通过一个鸦片烟鬼探究预备立宪的“真谛”，从侧面谴责了拥护预备立宪者的不良动机；而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则配合反美禁约运动，揭露了殖民者残害华工的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民初短篇小说多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还具有对现时社会深刻的批判性。如陶安化的《小足捐》塑造了一个后补官，为捞取跻登官阶的资本居然破天荒地想出“小足捐”。作品强烈地抨击了朝廷的腐败，嘲弄了地方贪官的可鄙嘴脸；又如觉迷的《不倒翁》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那些政治投机者的丑行；而恽铁樵的《工人小史》则通过技韩蕻人被凌辱的历史，控诉了外国商人对中国工人剥削的罪行；至于企翁的《欧战声中苦力界》，毅汉的《罢工人》，刘铁冷的《空谷佳人》，瘦鹃的《檐下》，无愁的《渔家苦》等作品，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这时期的短篇小说还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自由婚姻的渴望。其中既有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抨击，也有对旧伦理道德的屈从；既有对自主婚姻的热烈追求，也有对资产阶级性爱“自由”的否定。如韦士的《采桑子》写韩才和采桑女向往自由恋爱却未能遂愿而双双自杀的悲剧。李涵秋的《蝴蝶相思记》写周栩和蝶奴虽互有爱慕的愿望，却无大胆追求理想婚姻的勇气，终使有情人未成眷属。这类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并非全部平庸，周瘦鹃的《真假爱情》则写郑亮在个人爱情与革命事业发生矛盾时，毫无动摇献身革命的故事，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传统的短篇小说多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叙述作品，而这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则借鉴模仿西方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如卓呆的《温泉浴》。“余”（我）是故事人物活动的见证人。在日本箱根“旅馆之夜”，“余”听到隔壁两人的对

话，其中一个自称留学生的发表了关于“嫖妓”的高论，而第二天在“温泉浴旁”，“余”吃惊地发现，昨夜打听嫖经的竟是国内的“某改良会会长”。这会长在见到沐浴女子时呆若木鸡的丑态，则暴露了他肮脏的灵魂。这篇作品自始至终由叙事人“余”之一闻一见所组成。“余”虽未与故事人物直接发生联系，却在文章结构上起到连缀的作用。而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则更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典型例子。作品前后两部分都是用我亲闻亲见的口气来叙述，中间鸦片鬼（即我中我）的自传，则用其自述亲身经历。这种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能加强作品的真实性，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作者并没有先从主人公韩蕤人的身世入手来叙述他的小史，而是运用插叙的手法追叙他的经历。作品集中描写了韩蕤人两天的活动，其间写韩蕤人在南京走投无路欲往上海时，却笔锋一转，叙写他途中结识李有发的经过，又由李有发引出韩蕤人在上海投河自尽的情节。过去的幸是眼前贫困的序曲，眼前的贫困又是过去不幸的继续，而过去和眼前的遭遇又预示着将来的危机。虽然作品在情节上有较大的跳跃，但却同样显示了主人公的“历史”。这种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传统短篇小说由始至终平铺直叙的叙事模式。

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注重环境描写，也是这时期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就以注重心理描写见长。作品写主人公郑亮在朋友张伯琴落水呼救时一刹那的心理活动“这人是吾情敌，夺吾的意中人，吾何必去救他？他死了，也好使那负情侬心理悲痛悲痛，也算出了吾心头的怨气。”郑亮在救人生死的紧要关头所产生的想法和心理活动是符合特定人物性格的。张伯琴毕竟是郑亮的战友，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理智战胜了感情，郑亮“停了会儿，猛可里长叹一声，颤

巍巍然立起身来，跃入河中。”作者善于捕捉郑亮头脑中的一闪念，真实地写出郑亮复杂的心理活动，写出大义与私念的矛盾。这并未损害郑亮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反而使他有血有肉，艺术形象更为丰满。

如果说《真假爱情》是善于刻画心理活动的话，那么刘铁冷的《空谷佳人》则注重环境描写。作品在人物未出场之前，先写病妇居室周围的景致，从荒郊的茅屋，深秋的月夜的描写，可以想到主人公凄凉的处境和不幸的遭遇。这种注重景物描写的手法，更能表现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进而震撼人们的心灵。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以上仅择其要，略加评述。总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以往的时代。但是由于内容庞杂、篇幅浩繁，散见在当时的几百种报刊上，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对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加以系统的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这次编选的短篇小说共有八百余篇，近四百万字。因为当时言情类、社会类小说居多，而科学类、家庭类小说较少，因此不能按数量比例编选，只好言情、社会类的小说精选一些，科学、家庭、伦理等类的尽量收录，为的是给研究者多提供一些资料。这次收录的作品为：社会、侦探、武侠、爱国、笑话、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十类。

社会小说在这一时期小说中所占比重较大，有目可查的近五百篇（种）。这类小说包括的范围较广，有提倡新式教育的（《学究教育谈》、《塾师现形记》）；有破除迷信的（《放河灯》《妖火》、《佛无灵》）；有提倡妇女解放的（《女权泪》、《离莺》）；有反对吸食鸦片的（《禁烟小史》）；有写下层社会人们生活艰辛的（《穷愁》、《柳苦儿》、《苦教员》）；有揭露军阀暴戾的

(《红菜苔》；还有抨击治腐败的(《机鉴》、《官话》、《假慈悲》、《我矛我盾》、《一贫一富》、《诸君欲作盗贼呼?》)等等。作品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群体，从军阀、政客、富翁、财主，以至商贩、农民、教员、妓女、女学生、泼皮无赖、盗匪小窃，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末民初的社会画面。

侦探小说是外来品。定一在《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的《小说丛话》中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名。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俄国侦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此话大概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侦探小说的最早评论。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小说丛话》也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者矣。”侦探小说采用“开局之突兀”，“倒装叙述”的手法，很能吸引中国读者。虽然中国小说家们未得侦探小说的要领，但一时争相模仿为尚，翻译引进成风。先是译介西洋名家的小说，如亚森罗萍探案、霍桑探案等接踵而至，很快一些中国自产的侦探小说，如《东方之亚森罗萍》、《侦探界之拿翁》、《女侦探》《女警察》等相继问世。

当时的一些名小说家也创作不少侦探小说，如王汉章的《金沟盗侠》，包天笑的《女装警察》，天虚我生的《衣带冤魂》，俞天愤的《柳梢头》、《烟影》，程小青的《花石曲》、《司机人》、《石上石》，贡少芹的《化装美人》、《女红薇党》，顾明道的《灯光人影》等。这些根据世间案例，警匪轶闻师法泰西侦探小说而创作的中国侦探小说，虽然还显得幼稚，但这种尝试毕竟是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平铺直叙写法的突破。尽管这种模仿还未得西洋侦探小说的真谛，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山

业绩，因为中国的侦探小说正是由此而生而长。

中国的武侠小说虽然源远流长，但在民国以前并不称为武侠小说。宋代的《梦梁录》和《醉翁谈录》把这类作品归于“朴刀”、“杆棒”项下，明代有人集《聂隐娘》等篇，名之曰《剑侠集》，及至光绪末年，人们才称之为“侠义小说”、“侠义小说”等。“武侠”一词见于《新小说》第十五号（1905）《小说丛话》。其中定一论《水浒》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关于“武侠”一词迄今尚无更早的发现。此后小说杂志中多用是词。觉我（徐念慈）在《小说林》第九期《余之小说观》中提到：“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并在所译日本小说《武侠舰队》一文中多次使用“武侠”一词。民国以后有小草的《武侠鸳鸯》（《礼拜六》38期，1915），林琴南的《傅眉史》（《小说大观》第三集，1915）就明确标为“武侠小说”。自此，武侠小说的名称遂被人们广泛使用。

清末民初有大量武侠佳作出现。如：冷血（陈景韩）的《侠客谈·刀余生传》，（刊载《新新小说》1—2号，1904）就打破中国传统小说平叙的写法，而以简洁有效的手法，对故事中最精彩的片段加以描写，能紧紧抓住读者。难怪此篇被誉为中国近代短篇武侠之祖。早期的短篇武侠小说还有：侠少年的《母大侠》（1905），同仇的《仇人头》（1906），轩胃的《侠报》（1907），伯耀的《侠女奇男》（1907），亚东破佛《歼鲸记》（1907）等。这时期的短篇武侠小说虽一度兴盛，但随着武侠小说的大量流行，也产生不少弊病。

清末民初的爱国小说目前见到较早的有《杭州白话报》（1901）上曼聪女士的《女子爱国美谈》，无名氏的《亡国恨》，《广益丛报》（1903）上无名氏的《卖国贼卖国贼》，巢南子的

《越裳亡国史》及《汉帜》上旧民的《亡国余痛书》等。

爱国小说所反映的社会面较广，其中有历史英雄，如明朝中后期的抗倭将士盛宗培、邱将军；有抗清的陆世钥；有鸦片战争中的左宝贵、陈化成；有中法战争中的凌成庙、滕玉亭；有甲午海战中的邓世昌等；还有普通人物中的乞丐、商人、厨役、妓女、华工、学生。其中瘦鹃的《为国牺牲》歌颂了中华民国对日宣战中的英雄；剑秋的《五月九日六点钟》以记梦形式抨击袁世凯外交上的失败；朱鸳雏的《爱国之妻》、微尘的《祖国之女》、李涵秋的《爱国丐》等，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爱国精神。

这类小说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的表现了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如《为国牺牲》中的顾明森大尉，在中华民国对日宣战后，毅然背妻离室，奔赴战场，最后以身堵炮眼，壮烈牺牲；有的表现爱国与爱情的矛盾。如海涵《爱国鸳鸯记》中的朝鲜国男女英雄李琼枝、郭敬一能舍弃儿女之情，为国为民族杀敌立功，舍身捐躯。而《女露兵》、《南山情碣》、《莫教儿女误英雄》中的主人公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的感情服从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这时期的爱国小说总本上看，表现出积极的进步倾向，成绩是主要的，但瑕不掩瑜，其中也不乏忠君忠孝之作。

中国文人编辑笑话的历史已有千年，但清末民初的“笑话小说”与古人的“丛残小语”式的小说，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笑话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大概首次是由吴趼人在其《新笑林广记》（《新小说》1902年创刊号）序言中提出的：“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吾国笑话小说，亦颇不鲜，然类皆陈陈相因，无甚新意识，新趣味。内中尤以《笑林广记》为妇孺皆知之本，惜其内容鄙俚不文，皆下流社会之恶谑，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自此“笑话小说”以一枝独秀，